试论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

郭道晖

权利和权力是法律上的一对基本范畴，它们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

关于什么是权利，是法学史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有自由说、意思说、利益说、法律上之力说等等诸多定义。什么是权力，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础上强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于自己的意愿的能力。”^①有的说，权力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者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②还有的说，国家权力“是一种组织性之支配力，……是制定法律、维持法律与运用法律之力。”^③

本文不讨论一般的权利与权力定义，主要就我国法律上公民的权利（以及法人与其他组织的权利）与国家权力（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军事机关的权力，下同）的关系，探讨它们的联系与区别。

一、权利与权力的相互依存

（一）权利与权力的相互渗透

权利一词在英语为Right，权力为Power，二者是有区别的。但英美法学界又常把这两词通用。如《牛津法律大辞典》有“民法上的权力”这一词条，并定义为：“有权做具有法律效力或作用的事情的法律概念，如，立遗嘱；如果不还借款，债权人有权出卖抵押物，……通常认为权力只是更广泛的‘权利’概念的含义之一。”^④这里所讲的权力，实即民事权利。他们还把权利分为“私权利”与“公权利”，公权利即政治权利，与政治权力相通。日本人把德文的权利（Recht）译为“权力利益”，略作“权利”，也含有权力的意思。

法律上的权利，就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或抑止一定行为来说，即就这种权利对他人的影响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即他人有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否则公民就有权要求国家运用强制手段进行干预，保护或帮助实现其权利。这时，权利就借国家权力

① [英]A.布洛克等编《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53页。

②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卷英文第15版第697—698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编《政治参考资料》1983年第1期第55页。

③ 谢瑞智编《宪法辞典》，台湾文笙书局1979年版，第81页。

④ 《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08页。

而显示其“法律上的力”了。

同样，权力也可以同时表现为一种权利。如人大的提案权、质询权等等，就人大的职权来说，是它的一种权力；对人大代表来说，则又是一定数额的代表共同行使的个人权利。

此外，同一主体，可同时享有权利和拥有权力。如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负责官员）拥有国家授予他们的权力（职权），又享有一般公务员所享有的薪给权、退休金权、职务上使用公物公款权等等权利。国家作为主权者，对内有统治权（权力），对外有独立权、平等权、贸易权、自卫权等不容外国侵犯的权利。

所以，权利与权力是互相渗透的。权利中有权力，权力中有权利，广义的权利即包括权力在内，权力也是一种权利。

（二）权利与权力的相互转化

权利可以转化为权力。封建时代王位继承权是一种权利，继承王位后，就转化为一种统治权力了。财产所有权是财产所有者的一种权利。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马克思所说的：“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①在我国，人民通过选举权（权利），选出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的权力，权利就转化为权力了。

权力也可转化为权利。即通过权力来确认、保护权利，使权利得以实现和不受侵犯。

（三）权利与权力的渊源

权利和权力是怎样产生的？自然法学家把权利说成是“天赋”的。在此基础上，社会契约论者卢梭，认为是公民相约让渡其全部自然权利，去造成政治社会（国家）的权力，从而使自己在这种整体的共同力量——权力的保障下，重新获得他所奉献出的同样多的社会权利。美国思想家潘恩则认为只是将一部分个人能力所不能实现的“天赋权利”“存入社会的公股中”，由这“入股”的种种天赋权利（潘恩称这部分权利为“公民权利”）集合而成社会（国家）权力，使之来保障天赋权利和公民权利。^②

这里，姑不论这些理论的臆想性、非科学性，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权利与权力是相互依存的，但是，是先有权利，后有权力，权利先于国家权力而产生，然后再由国家权力来保护。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权利不是天赋的。权利与权力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权利与权力的渊源上说，历史发展的进程并非先有权利后有权力，而是相反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下，人们并无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只是到后来出现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才有了公共权力，有了法律，然后才有为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权利。正如恩格斯所说：“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且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③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是通过与统治权力进行斗争而赢得一部分权力（如英国议会的立法权），从而获准有一定的权利。而在它夺取政权之后，立即运用国家权力，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把某些社会关系规定为法律上的各种权利义务，确认其私有财产权为神圣不可侵犯。同样，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于无权力的地位，其所享有的某些权利（如普选权）也是通过同资产阶级的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0页。

② 参见潘恩：《常识》，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第3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67页。

斗争得来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只有夺取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有了人民的权力之后，才享有了广泛而真实的权利。

因此，权利是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夺取权力的阶级斗争实现的，按阶级力量的对比进行分配的。夺取国家权力在先，获得权利在后，权力是权利的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是权利的前提，无权力即无权利。所谓“没有人民的国家，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也包括了这个意思。人民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决定一切的。那种把权力看成只是一种消极力量，而主张“淡化”它，显然是忽视了权利对权力的依存性，也没有把人民的权力的绝对性、主导性、无限制性，同政府权力的相对性、派生性、受制约性区分开来，也没有把它同被滥用的权力的侵犯性、腐败性区分开来。

我们说“权力是权利的前提”，是从人民权力的绝对意义上讲的。至于就某届政府或某个政府官员的权力而言，则公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因为，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在我国，政府机关领导成员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权力由人大授予，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而人大代表则是由选民选举（直接地或间接地）产生。因此，人民的选举权（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

从另一意义上看，人民夺取政权，组织新政府，也可说是人民行使革命权、起义权的结果。当然这种权利不是旧的统治者的权力（法律）所赋予的，不是旧法律上的权利，只是人民的一种道义上的权利或“应有权利”。不过，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这种革命权也曾被宣布为法律上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中就明确宣布人民有权利改变、废除或推翻倒行逆施的、损害公民权利的政府，建立新政府。法国人权宣言也曾把“反抗压迫”作为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种宣告，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意愿与革命实践。但到资产阶级统治巩固以后，它就再未提起，而把它演变为在服从资产阶级统治权力的前提下的公民的申诉权、请愿权了。

总之，权利与权力是相互依存的，人民权力是前提，人民权利是基础，政府权力是由人民的权利和权力所派生的。“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和“原始权威”。^①

二、权利与权力的区别

权利与权力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既相统一与平衡，同时又以各自的特点相互区别。

（一）行为主体与行为属性不同

在我国法律上，权力（或职权）与权利之分，主要是从行为主体上加以区分。权利主体一般是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国家机关进行民事行为时，也是权利主体）。权力主体则只能是被授予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特定的工作人员。按其行为属性来讲，权利行为一般是民事行为与社会政治行为；权力行为则一般是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司法行为等属于公务的行为，又称“职权”，是一种公共权力。权利一般体现个人或法人等主体的利益；权力则不体现权力行使者的个人利益，而以国家社会的公益为目的。所以，权利与权力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私与公的区别。以权利谋“私”可，以权力谋私则是非法的。

（二）强制性不同

权利和权力都对相对人具有强制性。法律上享有权利的主体，可以依法要求相对人为或不

^① [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版第257页。

为一定的行为,这也是一种强制性,但它与权力的强制性不同。权力具有国家的直接强制力。如马克思所说,国家权力是一种“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①(当然,“暴力”不一定是武力,恩格斯讲:“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②,“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③)权利则只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当权利不能实现或遭到侵犯时,权利人可以请求国家行使权力予以保护或救济,但权利人不得自行对相对人施以强制力(如不得为索债拘禁债务人)。因此,权力的强制性是直接的,权利的强制性则是以权力为中介,是间接的。

(三) 法律地位不同

权利可由权利人独自享有,可以是一种有特定相对人的权利(如债权),也可以是有一般相对人的权利(如财产所有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在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义务人的双边关系的条件下,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权力则只存在于与具体相对人的关系中。单独的主体无法行使其权力,因权力须以对方的服从为条件,是管理与服从关系。因此权力是单向的,自上临下的,双边关系是不平等的。

(四) 对应关系不同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对一个人是权利,对与之相关的特定人(对人权)或对一般人(对世权)就是义务;就权利主体自身来说,也要承担不滥用权利的义务。一方行使权力,相对方就有必须服从的责任,拒绝服从或妨碍、阻挠行使公权力的,要追究法律责任。对权力主体自身来说,也不得越权侵权,否则也要追究法律责任。

(五) 自由度不同

权利有所谓“剩余权利”,即法律上未规定为权利,而又未加禁止的事,可以推定公民有权利做。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种权利,而认为人民所保留之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被抹煞。”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国宪法对公民行使权利只作了一条限制,即“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自由度还是很大的。

权力则不然。政府行使权力必须有法律根据,即所谓“依法行政”。凡法律未授权的事,权力主体不得做,否则就是越权。所以政府行使权力的自由度应是较小的。不过,政府虽无“剩余权力”,却有“自由裁量权”。现代行政法学思潮有一个新趋势是,由“依法行政”进而强调行政应是“给付的主体”,其本质是服务或授益,对有关人民生活福利的事,给以充分的关注和照顾。凡无法律禁止与限制的事,当人民有所求时,行政机关也可以运用裁量权给以满足。行使行政权力贵在自动与主动,积极兴利。从这个角度看,在合情合理又不违法(法无明文规定)的范围内,适当扩大行使权力的自由度也是必要的,否则也会为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僚主义者借口于法无据而对人民不尽心尽责。

在自由度上还有一个区别是,权利主体对其享有的某些权利(如物权债权)是可以转让或放弃的(有些权利则不能放弃,如人身权)。权力主体则对授予它的权力都不得放弃或转让,政府权力对国家也是一种责任(职责),既不得滥用,也不得怠用、不用,否则就是失职。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权力的自由度也是不及公民权利的。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从总体上说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它自己可以修改宪法和制定与修改法

① 《资本论》第1卷,第8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91页。

③ 同上书,第18卷,第655页。

律)其自由度是最大的。当然,它也不能违背人民意志与利益行事,其自由也不是绝对的。

(六) 集散性不同

公民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同一种公民权利分散为所有公民人人所享有,同时,各种公民权利又是集中为同一主体(公民)所全部拥有的。各种公民权利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不能分割,即不能有其一无其二。马克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象身体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①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衔接的。失去某一种权利,也影响其他权利的行使。譬如失去人身自由权,也就谈不上言论、集会等等自由权利的行使。没有法定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上述各种自由与权利也是空的,当然,对罪犯可以剥夺其人身自由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但这样他已不是一个完整的公民(而是罪犯)。这是权利的非正常状态。

至于权力,由于它具有扩张与侵犯的特性,要求不同权力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相互制衡,不能集中于一个国家机关、或某一个政党组织,更不能集中于一个人,否则就会形成绝对权力而导致专制与腐败。当然,这里指的只是政府的权力。至于国家的主权或人民的权力,则是不容分割的。资本主义国家讲“分权”,也并非阶级分权(这只在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时是如此),不是把资产阶级国家的主权,分给别的阶级,而只是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内部在政体上的权力分工,把统治权分散由不同职能机关行使,以收相互制约与平衡之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权力也是不容分割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即使如此,这种集中也不是绝对的。一是人大的权力也要受人民的监督;再则,在人大集权的前提下,仍是将行政权、审判权、监察权以及军事权等等,授予各政府机关分工(分散)行使。

人们常常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称为“议行合一”的制度。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我国一切权力集中于人大,但并非人大直接行使一切权力。这里,一切权力的所有者,并非是一切权力的直接行使者。这也可以说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吧。在立法权上,人大是“议行合一”的,它直接行使立法权。在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上,则是由人大“议”(立法),授权有关机关去“行”(执法),人大并不去包办。这些机关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是“议行统一”,即这些权力最后要“统一”到人大,但不能说是“合一”。

三、权利与权力的冲突

权利与权力既有上述区别,也就会有矛盾,乃至对立与冲突。

权利与权力产生互相排斥的对立(对抗),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 权力否定权利

这有几种情形。在专制权力统治下,人民权利受压制,被抹煞或匮乏,权力与权利处于对抗状态。这种对人民权利的否定,是为了肯定、巩固其专制统治权力。另一种情形是政府或其人员滥用权力,侵犯、压制公民的权利。还有一种情形是,公民或组织滥用权利,损害了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或阻挠、破坏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得行使权力剥夺他的某些权利。这种对权利的个别否定,则是为了肯定和保障整体的权利与权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4—95页。

（二）权利否定权力

这也有几种情形。一是在专制压迫下，人民通过革命斗争（行使革命权），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的权力，争取人民的权力和权利。二是在人民掌握权力的条件下，对滥用权力或怠用权力（失职）的机关与人员，行使检举、控告、罢免等权利，以制止权力的侵害，直至撤销对他们的授权。这种对权力的否定，则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正当和充分的行使。这些权利的设置，是为了抵抗权力的侵犯的，可称为抵抗权或救济权，它们与权力的滥用经常处于对峙或对抗状态。

（三）权力限制权利

社会主义权利观要求权利的个体性与权利的社会群体性相结合。在必要时允许国家权力从社会群体利益出发，对个人权利作适当的限制、干预或控制。如实行计划生育，以限制人口（从而限制了生育权）。不规定迁徙自由，以限制城市人口。在遭遇特大天灾、战争或内乱的情况下，为保护人民、保卫国家，可宣布紧急状态，实行戒严，暂停公民的某些宪法权利与自由。此外，有的权利如超过一定时效，也不受公权力的保护。如超过时效的请求权，为无胜诉权的权利，不能借国家公权力对程序法的执行，而得到保护等等。

这里还需说明，权力对权利的限制，也是有限制的。不是任何权力都可对公民权利加以限制。如属于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只能由最高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规限，而不能由法规、规章来规限。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权力，只能由司法机关来行使。

（四）权利制约权力

这是有必要着重讨论的重要问题，详见下节。

四、以权利制衡权力

由于权力有侵犯性与腐蚀性的一面，如何制约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利，历来的先进思想家费尽脑汁力图找出一条最佳途径。这个问题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发展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三种方略。^①

第一阶段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主张自然权利的最终保证应当主要从统治者的智慧、自制中去发现，即求助于开明专制，寄望于统治者的贤明与自律。第二阶段以洛克和孟德斯鸠为代表，提出用分权的方法来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第三阶段以卢梭为代表，强烈主张人民主权和民主。现在大家谈论较多的是孟德斯鸠的“以权制权”，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论者很多，笔者不必赘言。这里我要着重提出讨论的是以权利制衡权力的问题。

人民的权利是约束与平衡权力的一种社会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决定性的基本力量。古典自然法学家如洛克，虽主张权力分立，但同时也承认自然权利的另一个最终保护者是全体人民，人民可运用其权利罢免和更换立法机关，当行政权或立法权试图变更其统治为专制，奴役或毁灭人民时，人民的最后手段就是行使抵抗或革命的权利，以反抗压迫，成立新政府，维护自然权利。卢梭强调人民主权论，政府只是人民的办事员，至高无上的人民可以按其意志而废除、限制或变更它。这些都是更看重人民的权利（或人民的权力）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作用。但实际状况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制衡，只限于统治机器内部各个权力部件

^① 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页。

之间的制衡，形成一个权力封闭的回路系统，而人民则处在这架密封的权力机器之外，没有权力、也不能运用权利对它进行制约。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也需要制衡，而且更有条件运用人民的权利来制约，以防范人民自己的国家侵犯人民自己，防范公仆变成主人。当然，这里主要还是指对政府权力的制衡；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虽也受人民权利的制约，但由于目前实际状况是它还不能说已如实地提到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现在主要是要支持它充分行使国家权力（特别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而不是削弱它。另外，这里笔者是讲权利“制衡”权力，而不单是制约，是想表明在我国，权力与权利应平衡发展，而不是只通过制约去削弱一方，“淡化”一方。制约也只是制约权力的扩张性，侵犯性。合法的正当的权力则应与权利同步加强。

如何以权利制衡权力，试提出如下几项原则与途径。

（一）广泛分配权利——扩大权利的广度，以抗衡权力的强度。

民主的一个要义是广泛分配权利。剥削阶级社会由于是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因此，总是把权利限制在本阶级的狭小范围。公民即使名义上享有某些权利，也大都受法律上和物质力量上的种种限制，因而很难影响、制约统治者的权力。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人普遍享有广泛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11亿人民的权利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充分释放出来，足以制约人民自己授出的权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抓紧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使这些权利真正为全体人民事实上充分享有，并获得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集体行使权利——把分散行使的公民权利，集中为人民的权力。

公民权利是分散为各人享有的。就单个人的权利来说，其力量是很微弱的（选举权每人只有一票，言论自由权每人只有一张口一支笔），但集合起来，就可转化为集体权利与权力，就有巨大的力量。如通过集体行使选举权，选出代表人民的具有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制约政府权力。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过传播媒介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就可成为所谓“第四种权力”，来监督政府。当公民感到单个人行使某些政治权利还不能引起政府的关注，影响其决策或纠正其滥用权力的行为时，就可以依法通过组织集体行使这些权利（如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共同表达人民的意志与要求。集合起来的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影响力要大大强于个人分散行使权利。它往往是对付严重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是受法律保护的。当然，这类集体行动应当严格在法制范围内进行，并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定为前提，特别是从全局着眼。因为当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是人民的最大利益时，这种行使权利的方式必须慎之又慎，绝不能因此而引起社会动乱。

集体行使权利还包括切实保障和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这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行使集体权利，是对政府权力更为有效的监督。

（三）优化权利结构——建立与健全同权力结构相平衡的权利体系。

国家机器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权力结构。除了它内部各组成部分的权力之间要有相互分工与制约外，它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施加影响力、强制力时，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优质优构的权利体系，就不足以抵抗权力滥用时所造成的侵害。因此，人民的权力机关应当注意在授出权力的同时，就考虑到设置相应的权利与之平衡。在优化权力结构体系时，一方面要着眼于权力的配置能有效地、强有力地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协调地正当地行使，有助于它

们园满地实现。另一方面，则要不断优化、强化权利结构体系。如果说前述的广泛分配权利和集体行使权利是以权利之量来平衡权力的话，优化权利结构则是以权利品种的配置所形成的最佳结构质量，来制衡权力。这要求：

1. 优化立法体系。把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权利特别是民主权利的立法，摆在优先的和主导地位。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宪法权利的立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灵魂和支柱。它不只是关系公民个人利益，也是增强人民政治活力与经济活力的激素，可以激励人民的主人翁参政意识和监督意识，是制衡政府权力的重要力量。现在我国立法体系结构上权力立法与权利立法不均衡。据有关人士统计，1979—1989年中经济立法占全部法律、行政法规总数的60%以上，而公民民主权利方面的立法只占4%。属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含部分规范性文件）占行政法规总数的80%，而管理行政（包括监督）的只占0.87%。这种立法体系结构显然是不均衡的，值得引起重视。

2. 增植权利新品种。根据经济结构的需要和政治文化的发展，及时确立公民和社会群体的新的权利。如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实质上是要确认人民的了解权和参与决策权。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又提出要“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要“切实保障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和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都提出了在法律上确认和保障这些权利的要求，应当在立法上设置相应的权利，作出一些新的规定。又如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及时确认了私营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权利，从而使我国经济领域权利结构上有了新的发展，有利于防范行政权力的非法干涉，促进经济的繁荣。

（四）强化权利救济——发挥抵抗权与监督权的作用。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设置各种权利救济手段，不仅是给受损害的权利以补偿，而且是对权力的一种抑制与监督。救济权也是一种申诉权、监督权，它在权利结构体系中应当起安全通道和反馈调节作用。如行政救济（请愿、行政复议、行政赔偿）或司法救济（公民的控诉权、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既是救济权，又是监督和抵制司法权的误用或滥用的手段，行政诉讼法更是直接对行政权进行监督，直至宪法救济（宪法诉讼，公民向国家权力机关控告，引起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审查，这也可说是公民权利对立法权的制约。在外国还有公民的立法创制权和复决权，作为立法救济手段，以抵制立法的专横）等。

（五）提高全民权利意识——释放权利的“动能”，以抗衡权力的“势能”。

这就是说，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的自觉的权利能动性，使之变成制衡权力的物质力量。权力处于高位，其“势能”是很大的，但人民权利的“动能”充分调动起来，足以与之平衡。

（六）掌握制衡的度——以不妨碍合法权力正当行使为度。

我们在讲权利制约权力的时候，主要是制约其损害国家和人民权益的倾向。但不要忘记，权利既是权力的界限，也是权力的目的。人民赋予政府权力，旨在要求它为人民服务，保护和增进人民的利益。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二者不但要取平衡，而且还应运用人民的权利与权力，去支持和促进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譬如公民的政治权利，就不只是一种消极的请求救济权，也是支持政府的积极权利，通过参政议政，促进政府的工作，增强对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

权力以不侵犯权利为限；权利制约权力也应以不妨碍合法权力正当行使为度，否则有失人民授权政府的初衷。权力的滥用固然可怕，怠用权力、玩忽职守或权力没有权威，不能充分有效行使，则更为可虑。因为这会造成无政府状态，使公民权利失去国家权力的保护，使国家利益蒙受灾难。因此，权利也不可滥用来妨碍政府行使权力（譬如不能滥用游行示威权利来破坏社会秩序，阻挠公务的正常运行）。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公权力）的制裁。这就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权利制衡权力”的“度”。

（作者单位：中国法学会）
责任编辑：秦凤

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刘兆兴

对于民主问题，历史上不同时代、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们，从不同角度作过种种解释，特别是资产阶级学者们更把“民主”的概念和本质搞得混乱不堪。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崇拜、追求西方民主，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宣扬民主的“超阶级性”、“超国界性”、“无东西方之分”。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正确认识民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而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民主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democratia，原意是指“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政权”，也可以理解为“多数人的统治”。这是从本词的含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民主的含意作了科学的解释和阐述，指出民主是属于历史的、政治的、阶级的范畴，阶级社会的民主与国家形态紧密相联。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①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②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的概念，科学地反映出民主的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理论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